



中共党史研究

新视角

——（第四辑）——

宁都会议前后毛泽东与中共临时中央的关系
1937年十二月会议毛泽东的“孤立”及其原因
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原因
离休后八年邓小平的新贡献
胡耀邦拨乱反正与拨乱反正中的胡耀邦

罗平汉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中共党史研究

新视角

(第四辑)

罗平汉

主 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党史研究新视角. 第四辑/罗平汉主编.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211-07523-2

I. ①中… II. ①罗…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IV. 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5490 号

中共党史研究新视角 (第四辑)

ZHONGGONG DANGSHI YANJIU XINSHIJIAO

主 编: 罗平汉
责任编辑: 张 宁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 19 号楼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51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211-07523-2
定 价: 38.00 元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邮政编码: 350001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 选 说 明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是国内最早设立的中共党史教研机构之一。早在延安整风时期，中央党校就已经开始系统地讲授中共党史课程。这些年来，中共党史教研部的教研人员，在完成校内干部班次和学位研究生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承担了大量的各类科研课题，每年发表上百篇研究论文，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有着较大影响。本书所收入的，便是2009年至2013年中共党史教研部在职教研人员公开发表的文章的一部分。这些文章有长有短，涉及的内容既有历史事件也有历史人物，前三辑主要是历史事件的探讨，大体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进行排列，后一辑基本是关于历史人物的研究。本书的出版得到了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忱！

目 录

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卢 毅 (1)
对质疑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 1920 年的回答	陈 述 (9)
宁都会议前后毛泽东与中共临时中央的关系	罗平汉 (19)
1937 年十二月会议毛泽东的“孤立”及其原因	罗平汉 (69)
毛泽东与延安的学习哲学运动	李东朗 (85)
毛泽东领导地位形成过程中遇到的几次挑战	李东朗 (100)
毛泽东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	李东朗 (106)
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演变	李东朗 (122)
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原因	刘晶芳 (134)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几个问题的思考与实践	柳建辉 (144)
刘少奇与 1947 年石家庄市接管	李国芳 (156)
刘少奇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创构	刘宝东 (169)
大历史脉络中的人物关系——周恩来与胡适	张太原 (180)
离休后八年邓小平的新贡献	陈雪薇 (199)
胡耀邦拨乱反正与拨乱反正中的胡耀邦	陈 述 (215)
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陈 述 (239)
习仲勋与两当起义述论	李东朗 (252)
习仲勋与陈家坡会议	李东朗 (276)

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卢 毅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18岁，正就读于湘乡驻省中学。10月下旬，湖南起而响应武昌首义，积极拥护革命的他也就随之参加了湖南新军。他后来曾回忆：“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①后来，“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②。不过在此之后，毛泽东对曾经亲历的这场革命作过多次评价，他甚至还准备写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其中就要写到孙中山当临时总统、蔡锷反袁世凯的事迹。只是由于政务繁忙，此夙愿未能实现。^③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他是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论述得最早、内容也最全面和最深刻的。关于毛泽东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评价，迄今大多是就其一生的论说予以概述，而较少揭示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流变。本文拟就此作一番简要梳理。

一、早期的侧重批评

1919年七八月间，刚刚经历五四运动洗礼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其中写道：“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幸（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

① 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1954年9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8页。

③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08页。

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我们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是无论何时可以说可以做的。”^① 这是目前所见的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最早评价。它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这场革命推翻君主专制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也阐明了其缺乏广大民众的参与，没有建立起“民众的大联合”。文章见解之深刻，在当时是非常突出的。胡适即曾评价此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②。

到大革命时期，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为了与国民党右派辩论，于1926年1月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作了更为深入的剖析。他认为：“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③ 这就从革命口号的局限、组织的涣散和国际环境的不利等多方面，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

随着国民革命的风起云涌和对农民运动的加深了解，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缺陷和不足有了更清晰的认识。1926年夏，毛泽东在他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191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

② 胡适：《新书评介》，《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

③ 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5年冬），《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就说：辛亥革命没有提出农民的要求和需要，没有为农民而奋斗，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所以革命遭到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①稍后，他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又强调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②

大革命失败后，出于对国民党背叛革命的刻骨痛恨，中国共产党一度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采取严厉抨击的态度，认为“三民主义完全是一部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理论”^③，必须反对孙文主义，揭露“孙文主义思想的反动性质”^④。在此期间，毛泽东也很少提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对此，他后来曾解释说：“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⑤

二、逐渐增高的评价

抗战时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毛泽东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论说逐渐增多，评价也日趋增高。1938年3月12日，他

① 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记录稿，转引自鲁振祥：《孙中山·辛亥革命·三民主义：毛泽东半个世纪论说述要》，《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

② 毛泽东：《〈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记〉发刊词》（1925年10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③ 《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④ 《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1930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1930年7月23日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595页。

⑤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页。

在纪念孙中山逝世 13 周年的讲话中就提纲挈领地指出：“孙先生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接着又评价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不但如此，孙先生的伟大，还在于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孙先生的伟大革命家模范”，“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①。不久，毛泽东又公开声明：“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②

到 1945 年七大前后，毛泽东更是充分赞扬了孙中山的贡献。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论述孙中山便有 27 处，其中 6 处直接引用孙中山的有关观点，这一举动可谓不同寻常。他还向大家解释说：“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③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也说：“关于孙中山，在我的报告里很说了几句好话。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④以上这些对孙中山

①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1938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1—113 页。

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③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74—275 页。

④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1—322 页。

的褒奖之词，几乎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而究其缘由，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毛泽东确实在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那里找到自己创制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契合点，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共产党此时力求超越国民党和力争革命正统地位的意图有关。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多有论述。1937年8月，他在《矛盾论》中便写道：“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① 1939年5月4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讲演中也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② 这种认为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的观点，在中共党内应该是毛泽东比较早地提出来的。可以看出，为了维护当时国共合作的局面，这一时期他突出的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在这个讲话中，他还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从辛亥革命说起

^①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

^②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564页。

差不多”，“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①言词中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表彰是十分明显的。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还曾于1941年10月作出关于纪念双十节的决定，号召“全国各地应当举行热烈的庆祝和纪念”，并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一切真诚的革命志士，都是辛亥革命最忠实的继承者。”^②

此后，国共虽然再度决裂，但鉴于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符号具有强大的统战凝聚力，毛泽东对其评价仍然较高，而且还迭出新意。1947年2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就说：“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这种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这三次都是全国规模的。其他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土地革命战争等规模都不够，土地革命战争也没有发展到全国范围。”^③这种将辛亥革命的影响力列在五四运动乃至土地革命战争之上的提法，可谓是相当高的评价。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又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④这个说法也一改过去对辛亥革命反帝不足的批评，从正面肯定了其反帝性质。9月21日，他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又说：“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⑤这更是告诉世人，

①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405页。

② 《中央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1941年10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208页。

③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1947年2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④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3页。

⑤ 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只有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政权才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唯一真正继承者。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先抑后扬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固，毛泽东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评价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1954年9月，他在审阅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时，对涉及辛亥革命的部分作了修改，使之最终形成文字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但是当时的革命派是有缺点的。他们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因此他们不能取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①显然，这段文字的侧重点是批评辛亥革命的失败。

后来在讨论《宪法草案》过程中，又有些民主人士认为将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为了平息这些争议，毛泽东还专门作了一个《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讲话，明确指出：“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他还分析说：一方面，“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另一方面，“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

^① 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的批语和修改》（1954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46—547页。

不对的。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做了批评，现在我们就不能批评吗？”^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虽然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但并未说其成功，而是明确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其间的褒贬意味，是不难体会得到的。

1956年，由于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提出，情况又有了新变化。该年11月是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特意撰写《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号召大家“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至于其缺点，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②。显而易见，毛泽东此时为了顾全统战大局，分化国民党内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有了很大提高，不仅不再言其失败，而且重申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历史地看来，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论说，大体上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是同中国革命与建设以及国共合作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对这场革命成败得失的评价，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针对性和侧重点，旨趣亦不尽相同。这些论说，既不乏辩证与深刻，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政党领袖应对时局变化的政治智慧。

（原载《百年潮》2011年第6期）

^① 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1954年9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346页。

^②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157页。

对质疑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 1920 年的回答

陈 述

2008 年 12 月，《北京日报》理论周刊的同志向我约稿，说回答读者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时，自己填写的一份登记表上写的入党时间是 1920 年。2009 年 3 月 2 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我回答读者问的文章，题为《毛泽东的入党时间：1920 年》。如题目所述，文中认定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 1920 年。因为这只是回答读者的问题，不是一篇专门的学术文章，且篇幅所限，文中没有提供更多的史料依据。《炎黄春秋》杂志 2009 年第 10 期发表一篇题为《毛泽东入党年月考》的文章，随后炎黄春秋网以《孤证不立——也说毛泽东的入党时间问题》（以下简称《也说》一文）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作者对毛泽东（自己填写）的入党时间是 1920 年提出质疑，而且这位作者仅仅根据对《李达评传》一书作者的采访，及《李达评传》一书的内容就得出“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因而可以这样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的结论，这涉及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事实，又造成较大影响，因此，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以开展理性的讨论。

《也说》一文的作者说中共一大召开前“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历史当事人和见证人提供的直接史料。除直接的历史当事人毛泽东多次谈过湖南在中共一大前建立了共产党小组外。中共一大的其他代表也提供过相同的史实材

料。《也说》一文的作者说：“李达从1921年2月起曾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集中共筹建中的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中共一大召开就是他发的通知。”随后，《也说》一文的作者是以《李达评传》中的说法及他采访《李达评传》作者的说法为依据得出“长沙有无共产党小组或可存疑”的质疑。虽然这个质疑没有道理，但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历史当事人之一却是历史事实。那我们先看看李达在1955年8月2日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的说法：“这个组织（共产党——引者注）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①在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李达文集》第4卷中，1949年李达谈到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时说，“首先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成支部。另外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S. Y.）。于是，陈独秀函约北京的李大钊在北京组织，……毛泽东在长沙组织”^②。李达1958年在他的《七一回忆》一文中说得更明确：“一九二〇年八月，陈独秀等7人在上海发起了共产党。这个党的发起组，邀请北京的李大钊同志、武汉的董必武同志、长沙的毛泽东同志、济南的王尽美同志等，分别在各地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此外还邀请广州、东京、巴黎在当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发起了中国共产党。截至一九二一年六月为止，共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巴黎8个中国共产党发起组。”^③这三篇文稿，都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个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李达生前公开发表的回忆，可信度应该比《也说》一文的作者采访《李达评传》一书的作者的说法可靠得多。

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中共一大的

①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② 李达：《党的一大前后》，《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③ 李达：《七一回忆》，《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1页。

其他代表也回忆说中共一大前湖南或长沙有共产党组织，虽然有的叫共产主义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其他，但肯定湖南有共产党组织却是一致的。如董必武回忆说：召开中共一大时，“上海、北京、济南、湖北、湖南、广州有组织”^①。1937年，陈潭秋也回忆说：“当时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除留日学生与留法勤工学生外，只有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几个地方。”^②周佛海回忆说，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③。中共一大另一代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④。由于历史原因，周佛海和张国焘不会去有意奉承毛泽东。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也回忆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后又相继成立了五个支部，总共是上海、北京、广州、湖南、湖北、济南六个组织。”^⑤这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充分证实，在中共一大前的1920年陈独秀组织共产党的时候，湖南或长沙不但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而且在中共一大召开前湖南或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成为既有其名、又有其实的组织。其他中共一大代表和早期的共产党人对此还有回忆文章等，恕不一一列举。

1996年，俄罗斯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

①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1971年8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页。

② 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193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页。

③ 《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年版，第114页。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⑤ 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1978年8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页。

中心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49）》陆续在中国出版。这套资料丛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的第2册，有若干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档案资料。其中的一份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在一九二〇年年中成立的，当时共有六个小组，其中提到了长沙。^①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说：中共一大前上海共产党小组在七个到八个中心地区有它的支部。

以上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和档案材料说明，中共一大前湖南（长沙）有共产党的组织，绝不是孤证。通过整理20世纪的研究成果，有学者评述说：“从‘一大’代表的回忆来看，‘一大’十三位代表（包括包惠僧）除四人（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何叔衡）牺牲较早外，其余九人的回忆中都认为‘一大’前湖南就有共产党的组织。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的回忆材料是最可靠的依据。”^②这个评述有充足的依据，因而是真实的。

二

《也说》一文的作者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即毛泽东、何叔衡等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这是更没根据的推断。由于湖南所处环境极为复杂和险恶，对当时的反动统治者来说，毛泽东又是“危险分子”。所以当时初建的共产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十分隐蔽，这也造成了知道这个历史事实的

① 参见《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

② 金松林、田夫：《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评述》，《党史通讯》1983年第9期。